

V737/6

襄垣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襄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三月

《襄垣文史资料》第三辑目录

抗日烽火

- 襄垣的反蚕食斗争 吴殿甲 (1)
抗日战争时期襄垣工人运动的
回忆 陈茂艺 (11)
忆抗日战争时期郭庄村的五百农民
 大请愿 王绍苏 (30)
 忆纪念“九·一八”大会盛况 邢猷之 (43)
 目标信号树 崔福田口述
 李招财整理 (49)
 对敌斗争二三事 武海鱼口述
 李招财整理 (51)
西底巧捉日顾问
 狮山截敌运输车 郝仙棠口述
 李双成整理 (55)

教育史实

- 襄垣县教育史略 张林源 (58)
清末民初襄垣的小学教育 苗培兴 (69)
抗日一完小片断回忆 邢猷之 (76)

古韩文化

- 襄垣秧歌史略 向文瑞 (82)

国民党组织及其活动

- 中国国民党襄垣县党部始末 张林源 (103)
魏永祥和襄垣县北伐后援会 龚毓华 (111)

人物传略

- 王量宏传略 张林源 (114)
陈阳之传略 向文瑞 (117)

名人业绩

- 襄垣籍国民党起义将领曹国忠 马喜才 (119)

名胜古迹

- 韩州城遗址 向文瑞 (133)
崇福寺 向文瑞 (135)
永惠桥 向文瑞 (136)
仙堂寺 向文瑞 (137)

抗日烽火

襄垣的反蚕食斗争

吴殿甲

抗日战争时期，襄垣的反蚕食斗争是全面对敌斗争，也就是人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持阶段的人民战争，从地区上来划分，它包括根据地的反扫荡战斗，边缘区的反蚕食斗争，敌占区和敌伪军的工作；从斗争的种类上来划分，它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斗争；从力量上来划分，它包括野战军、主力部队、地方军（营兵）、民兵自卫队、人民群众。所以无论从地区上、斗争种类上看，还是从人民战争力量上看，都是全面对敌斗争。就反蚕食斗争本身来划分，它包括摧毁维持会、减租减息、游击战、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粮食为主的经济斗争、宣传为主的文化斗争。下面就蚕食的重要原因、反蚕食斗争的纲领、反蚕食斗争的过程、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四个题来论述。

一、蚕食的重要原因

造成1941年末至1942年初日伪蚕食抗日根据地，使襄垣大部分村庄成为维持会（伪政权）统治的严重局面的重要原因，众说不一。我认为把蚕食的原因完全推在襄垣人民软弱、县的某位领导人或中共县委、抗日县政府是错

误的，片面的。而重要原因是：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的治安强化运动。百团大战后，日军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美国和东南亚诸国，回兵巩固华北战争基地，把60%多的侵华日军和90%多的伪军用来围攻各抗日根据地。围攻的手段是总力战、治安强化运动。其战略方针是：清乡治安区（敌占区），蚕食边缘区（游击区），扫荡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所谓清乡，就是使襄垣敌占区成为殖民地，人民只能为日伪当牛做马，不能反抗；所谓扫荡，即以重兵闯进襄垣抗日根据地，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这里我们着重阐明一下蚕食。所谓蚕食，即以驻守在敌据点的小股日伪军来边缘区抢劫牛驴、衣服等财物，抓捕干部，群众……造成军亭恐怖，以伪县政府名义写信给边缘区各村，限期成立维持会，实行殖民地的政治统治，以收交维持费（按人头）、搜刮粮食及各种苛捐杂税，实施经济上的敲诈、勒索，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宣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新民会、协和会，收买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从文化上软化中国人的心灵。就这样，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象蚕吃桑叶一样，把边缘区变为敌占区。而这道边缘区迅速向根据地移动，逼迫襄垣抗日军民几乎无立锥之地。

第二、根据地部分封建势力投敌，而我党、政领导有些软弱。在日伪的威协下，抗日根据地的少数恶霸地主、老国民党员出面当维持会长或为维持会的后台老板，由士绅变为汉奸，与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蚕食抗日根据地。而中共襄垣县委和抗日县政府对那些投敌反变的封建势力，在投敌前，既未认真发动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削弱经济剥削，打

掉政治威风；投敌后又怕违犯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有关人权的规定，不敢严厉制裁。致使这些恶霸地主、汉奸肆无忌惮地胁迫人民维持了敌人。

第三、人民武装力量的削弱。抗战初期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经过百团大战，野战军的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很大，需要休整、补充后才能投入战斗；原来襄垣较强大的子弟兵团——县区两级脱产地方部队在百团大战前全部编入野战军，新建的独立营，包括基干、工人、青年三个连，在1941年底只有130多人，战斗力很弱；由于大部分村政权变质，民兵自卫队亦随之瘫痪。三种人民武装力量的削弱，使守备据点的日伪军连同伪组织，得以小股横行于边缘区，抓人、抢财物，破坏根据地的生产秩序与人民生活秩序，闹的人民生活不下去，不得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二、反蚕食斗争的纲领

正值日伪军、汉奸疯狂蚕食襄垣时，中共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彭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建设厅长刘岱峰、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中共三地委书记王一伦四位领导同志于1942年3月来到襄垣指导开展反蚕食斗争。他们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北方局关于开展反蚕食斗争指示，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和蚕食襄垣的实际，并根据襄垣社会情况和党、政在襄垣的工作，提出《襄垣县政府施政纲领建议》，经中共襄垣县委认真讨论，又经襄垣县政府政务会议通过，制定了《襄垣县政府施政纲领》。这一纲领实质是襄垣反蚕食斗争的纲领，也就是反蚕食斗争的方针。根据我的记忆，反蚕食斗争的纲领是：

- 第一、彻底摧毁维持会，抗战到底。
- 第二、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
- 第三、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
- 第四、争取开明士绅，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在全县的反蚕食斗争中，我们党、政、军（包括来襄战斗的野战军）、民（工、农、青、妇、武委会等群众团体），都认真宣传贯彻了这个纲领。反蚕食斗争全过程的实践证明《纲领》是正确的。

三、反蚕食斗争的过程

在《纲领》指导下，襄垣反蚕食斗争从1942年4月开始，到1944年12月准备实施局部反攻，历时二年多。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襄垣军民与敌展开生死搏斗，摧毁了维持会，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改善了人民生活，争取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建设成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局部反攻和战略反攻积蓄了力量，为支援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反蚕食斗争的全过程是：

第一、摧毁维持会，开展游击战，建立情报、警戒地带。反维持斗争一开始，就处决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汉奸，如下良的李定一、邯郸的赵保朝，发动群众，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并令其退回维持费。这样，群众就分清楚：共产党、抗日政府、八路军、决死队是为人民利益抗战的，而恶霸地主、维持会、伪军是压榨人民当汉奸卖国的。军队则以游击战打击从据点出犯边缘区之敌，以掩护摧毁维持会的斗争。赵永堂率独立营基干连在五阴山东口村，以伏击战打败襄垣城出犯的日伪军，保护下良群众分配了李定一

的财产，下良群众则送白面馍、小米汤到五阴山劳军。开展摧毁维持会斗争期间，来襄战斗的有八路军新二团、七六九团、十四团、总部特务团、决死三纵队七团、九团。部队最多时，前方每一个区以一个团打击出犯之敌。打得襄垣境内的守备日伪军不敢轻易出来。由党、政、民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则在军队掩护下，发动群众摧毁维持会。到1942年底把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距敌占铁路、据点2至10华里。为了及时知道敌人的动向，从敌占区到根据地建立了情报网，以鸡毛信和电话传递情报。又在五阴山经高庙岭到祝家岭的土山梁至敌占区边缘，建立了十华里左右宽的情报警戒地带，白天以红旗、树干为信号，无敌升旗、立树，有敌降旗、倒树，由自卫队员守护，军民看信号战斗、生产、工作，夜间由民兵放哨，以枪声、手榴弹声报警。

第二、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建设根据地。摧毁维持会后，工作组发动农民、工人起来与地主、矿主展开说理斗争，按中共中央政策和边区政府法令，实行二五减租（减原租额的 $1/4$ ），分半减息（1.5分行息），适当增加工资（襄垣经营地主多，煤矿雇工工资太低）。为了争取团结地主、矿主们抗日，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后，又提倡交租交息，努力生产劳动，多产粮食、煤炭和经济作物。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后，由于减轻了剥削，解放了生产力，就顺利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渡了荒，救了灾。县委带头，党、政、军、民吃糠菜、开荒种地。从1943年起，全县响应中共中央号召，执行战争、生产、教育三大任务。随着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时地重建了工、农、青、妇救国会，恢复了党组织，改造了政权，整顿了民

兵，壮大了地方军和野战军，加强了教育和文化活动，从而逐步建成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

第三、敌进我进，开展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针对日军、伪组织对襄垣清乡、蚕食、扫荡的进攻，我们在取得摧毁维持会胜利的基础上，继续向敌占区、日伪军进攻。为了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决死三纵队）将第二武工队（由营、连、排、班干部组成）派来襄垣，结合县区党、政、民干部开展敌占区各种抗日工作，其重点是建地下党和革命两面派政权，即表面上应付敌人，实质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如大平村党支部不仅掌握了伪村公所、伪自卫团，而且掌握了日军一个分队。为了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襄垣敌工站在三军分区敌工站和县的双重领导下，通过地下党、伪组织、伪军家属，开展了争取日伪军，瓦解日伪军工作，教育日伪军官兵为中国人的抗日事业做好事，在必要时起义、反正。如1944年驻大平据点的一个日军分队（班）携全部武器起义，中队长左庆荣率伪保安大队第二中队反正。以粮食为主对敌展开经济斗争，即动员敌占区群众交公粮、卖余粮，收到的粮食，除供党、政、军民食用外，出售在太行东线敌占区救灾。同时使伪币贬值，冀南币增值，从金融方面打击了敌人。还以宣传抗战必胜等为主，与敌展开文化斗争。为了加强一、三、四区的对敌斗争，于1942年秋成立了前方指挥部，统一领导与指挥敌占区工作、敌伪军工作和情报、警戒地带的对敌斗争。凡在这三个区活动的野战军、营兵、武工队、敌工站和各区党、政、民机构的对敌斗争均归它指挥。前方指挥部的第一任指挥是吴殿甲，政委是李钢，副指挥由野战军的团长担任。

负责人虽有更迭，但前方指挥部直到襄垣全境解放，才完成了历史使命。

第四、反跃进蚕食，围困送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蚕食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敌人又出了新花招——跃进蚕食。虒亭敌于1943年1月跳进根据地送返扎了据点，与扎在蟠龙、胡蛮岭、襄垣城、夏店、虒亭、段村诸据点之敌相呼应。妄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造成“囚笼”，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囚笼”里。从伪军扎送返据点起，县指挥部即命令三、四、六三个区组成围困送返的联防指挥部，指挥部的负责人是四区区长刘文桂、区委书记宋之敏（李占魁）、武委会主任李富昌（李一民）。联防指挥部组织决九团，后为七六九团一个连，三、四两区两个游击队和三、四、六三个区有关村的民兵，围困送返。在送返围困，布满小分队和地雷，以打击零星出犯之敌，实行劳武结合，掩护农民耕种，离开敌据点一华里的地方就下种锄草。敌以大兵力出来蚕食，我机动分队则以伏击、袭击、阻击等游击战予以打击，群众则转移。还以机动分队打击敌从虒亭据点经大池到送返的运输队，填井、控制水源。如果送返敌配合其它据点之敌进入抗日根据地进行打荡，我军民则以反扫荡迎战。敌来时，以小分队结合民兵在腹心地区，以麻雀战袭扰敌人，以阻击战掩护群众空室清野后转移到山沟和战斗窑洞里，主力部队则以营连为单位，从敌军包围合击的缝隙中突出去，袭击敌据点，破击敌交通线，以“釜底抽薪”战术，缩短敌之扫荡时间。经过半年围困，使守敌伤亡惨重，达不到跃进蚕食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吃粮饮水又困难重重，不得不于6月弃送返，逃回虒亭，沿途又被我毙伤数名。

1944年解放蟠龙、胡蛮岭后，襄垣军民就挣脱了“囚笼”，沐浴在解放区的阳光下，积极准备实施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局部反攻。

四、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

在长达二年半的反蚕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襄垣军民以人民战争击败了日伪军、伪组织，建设了根据地。其基本经验教训是：

第一、抗日为主，也要削弱封建势力，处理好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根据地军民以抗日为主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封建势力仍照旧剥削着农民，统治着农民，抗战力量是发动不起来的。尤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日本诱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投敌的形势下，襄垣少数恶霸地主出卖了祖国、出卖了人民，当了汉奸，维持了敌人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惩罚了汉奸，摧毁了维持会的经验也是宝贵的。所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一定要正确处理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即一方面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发动农民群众削弱封建势力的剥削与统治，抗日的潜力就会迸发出来；另一方面还要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抗战到底。

第二、全面对敌斗争为主，也要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根据地，处理好战争与建设的关系。大敌当前，不击败敌人，是夺取不了胜利的，只有竭尽全力，开展全面对敌斗争，才能达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但是，处在敌后独立自主抗战的党、政、军、民，一定要有人力、物力、财力的

支援，才能坚持持久战争；人民也需要得到利益，改善生活，生息繁衍。所以，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必须正确处理战争与建设的关系，即战争扩大了根据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掩护了建设；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物质、文化），生长了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支援了战争，使战争与建设相辅相成地向前推进。

第三、军事斗争为主，也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处理好军事斗争与其它斗争的关系。与武装到牙齿的日伪军斗争，只有真枪实弹、一次又一次地击败敌军，才能取得胜利，襄垣军民对日伪军进行了成千上万次战斗，才能取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在营兵、民兵自卫队中战绩最突出的是赵永堂、刘兴喜、张官卯、王德荣等杀敌英雄。但是，单纯依靠军事斗争是战不胜帝国主义施行的总力战、治安强化运动的，我们必须在展开军事斗争的同时展开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才能夺取胜利。所以，在反蚕食斗争中要正确处理军事斗争与其它斗争的关系，即多次军事打击，促使敌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早日到来，政治、经济、文化斗争，使敌占区人民和日伪军、伪组织人员人心向我，从而扩大抗日力量，缩小日伪力量，增强军事斗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又达到了摧毁维持会，建立、巩固抗日政权的政治目的。

第四、党、政、军、民干部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与巧妙的斗争艺术相结合，才能率领群众开展反蚕食斗争。制定《纲领》以后，县委就在泰山庙召开了干部会议，彭涛同志在讲话中鼓励了英勇奋斗、坚持工作的干部，批评了畏惧斗争消极回家的干部，提倡艰苦奋斗，英勇牺

牲。流行的话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干部们带头与敌人展开搏斗。把在战斗中牺牲的韩天喜等几位烈士隆重地安葬在烈士山上（现名八一山），鼓舞了斗志。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势态下，只有英勇牺牲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以巧妙的艺术与敌人进行斗争。如以伏击、袭击战术歼灭敌军，以一夜数次转移，避开敌之合击，运出敌占区的公购粮时放枪，伪村长到据点报告日伪军，“粮食被八路抢走了”。万一干部被俘，力争在群众或伪军关系掩护下脱险，苗增泉、李生旺就脱过险，脱险回来的干部，受到热烈欢迎。这样做的结果，干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牺牲并不多。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稳定干部与培养、提拔本地干部问题。党尽量稳定干部，使他们了解敌人，熟悉群众，便于领导斗争；注重培养提拔本地干部，本地干部成熟之际，就是斗争取得胜利之日。

第五、党的领导是全面的，既制定了《纲领》，执行了政策，又基本上正确使用了干部；既领导了对敌斗争，又领导了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建设。

以上几条经验教训，集中起来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政、军、民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战胜日伪军、汉奸，建设抗日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

（作者曾任襄垣县抗日县长、吉林省军区政委，现任吉林省军区顾问）

抗日战争时期襄垣工人运动的回忆

陈 茂 艺

抗日战争时期的襄垣工人运动，是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开展的。当时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提出“实行全面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民族”的号召，全国人民纷纷响应，高举抗日旗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冬，山西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薄一波同志派多运海来襄垣接任前牺盟特派员董渺川的工作，使“牺盟会襄垣县分会”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尔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地方工作团帮助下，成立了中共襄垣县工委，多运海同志任工委书记。当时决死队也开进襄垣协助工作，从此襄垣人民就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4月，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襄垣县同样遭到日寇的烧、杀、掠、掳。血的事实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解救中华民族于苦难之中。在抗日救亡号召的鼓舞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成立抗日救亡团体——自卫队、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积极开展抗日斗争。

同年9月，在大黄庄营盘召开全县约三万人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大会，进一步贯彻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各界人

士奋起抗战，誓死不当亡国奴。会后各村镇到处呈现出一派抗日救亡景象，全县抗日救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一、襄垣工人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及初期的活动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工厂停产，许多工人失业回家。家系襄垣的太原兵工厂工人李崇义和榆次纱厂工人赵云庭（赵登官）、王爱良（王双义）、赵国厚（赵银保）等人回到家乡，党组织、“牺盟会”正在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们在抗日浪潮中，有的参加了“牺盟会”，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参加了三专署在沁县大桥沟开办的抗日救亡训练班。特别是李崇义、赵云庭等同志还酝酿成立工人组织。他们从1938年3月开始筹备，经过一段工作，于同年五、六月间，在县城小坑浪一家商店里，由李崇义、赵云庭、王爱良、赵国厚等人负责，召开了县第一次工人代表会。参加代表大约十四、五人，会议通过成立襄垣县工人抗日救国会，并推选产生了县工会领导，李崇义任秘书，赵云庭、王爱良、赵国厚、王安民均为委员，李慧民为文书。接着在全县的三个区，成立区工会。一区由江年生负责，二区由董秀清负责，三区由史汉章负责。后来增加了四区，该区工会由刘锦昌负责。之后，郎成太也参加了四区工会工作。县区工会成立后，又相继成立了南、北煤矿工会、“襄垣县纸厂联合工会”。南矿以五阳岭为基点，包括南沟等地，县工会王安民主持召开会议，有三十多个大小煤矿，1000余工人参加，一致推选以赵满富为首和崔德胜、李育纲、米起云等同志，组成南煤矿工会。北矿以五阴山为基

点，包括磁窑头、桑树沟、窑峪沟等地，推选以胡全为首和许爱臣、郝留锁、赵花虎、彭满成等同志，组成北煤矿工会。城关以东畛纸厂为基点，包括南关、西关、陡沟等十四家纸厂工人，组成纸厂联合工会，在李崇义同志的主持下，推选李载阳为联合工会主任，陈茂艺为副主任，韩海生为组织委员，连秃孩为宣传委员，刘彬任秘书。此外，全县各村镇也都相继建立了不脱产的工会组织，以行业设立小组或联合小组，如雇工小组、羊工小组、手工业铁木匠小组等。

工会组织一经成立，就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使工人明白，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既要解放自己，又要团结资方，以求达到改善工人待遇、发展生产、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目的。至1939年，工人们在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向资方开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增资斗争。东畛纸厂工会成立后，发现工人工资低，劳动一年还养活不了一人，因此生产上不来，资方收入也增不了。再加遭受日军扫荡的破坏和旧政府的苛捐杂税盘剥，资方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那时候这一带的操纸工、技术工，每操1区纸（190张）得工资3分。一个劳动日平均操纸6区，得工资1角8分。每月出勤按30天计，共操180区纸，得工资是5元4角，可买米5斗，还不够两个人一月吃，更不说其它医药和日常生活费用。晒纸工人的工资只有操纸工的一半，每晒一区纸的工资1分5厘，每月得工资2元7角，勉强养活一个人。学徒工更可怜，三年后才能出师成为一个晒纸工，待遇微薄，一年只有五、六元钱，不够鞋袜衣服之用。资方剥削工人过重，工人待遇低，生产积极性不高。于是以工会名义请来资方，

同工人代表举行座谈协商，讲清提高工人待遇，发挥工人积极性与提高生产数量，保证产品质量，支援抗战的道理。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一是要求资方给工人提高工资，二是向资方保证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资方也可以多受益，劳资双方都有利。经过协商，工人斗争得到胜利，资方也感到满意，劳资双方关系协调了，统一拟定了工资标准：操纸工提为每操纸1区，得工资3分5厘至4分，技术高者可得到4分5厘；晒纸工每晒1区纸，提高到2分5厘，技术较好者可得工资3分；制料工每月工资增加到2元至2元5角，技术高的可增到3元。工人们向资方保证，要在生产中节约原料、多产纸、产好纸。操纸工每天由6区达6区半至7区，每区纸节约原料1两到4两，每月由操180区纸提高到200至210区；晒纸工向资方保证不晒破纸，张张达到面光质好，减少废品；制料工向资方保证碾料要碾细、洗好、洗净，提高纸的白度、精度。资方听了工人的意见，感到非常满意，从而使劳资关系得到改善，生产得到提高，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发展生产，支持抗战。

工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曾注意服从共产党的政策。当时襄垣县政府，还未彻底改造，必须利用旧政府行文派差。那时手工业工人家里还得负担“官家”差事（资方也不例外），所以每逢派到差事，工人就得停工支差。造纸业是流水作业，只要有一道工序停作，影响他人工作，都得跟着停工。工人支差走了，厂方不敢提意见，因为这是公差。工人要求厂方面出面与政府商议免役，保证正常生产，但厂方无能为力。于是工人、资方都向工会提出要求，请求工会出面与政府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工会领导经过考虑，认为双方提的